

# 新质生产力赋能美丽中国建设的生成逻辑、现实困境和实践路径

戴春勤 孟丽婷

(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兰州 730050)

**摘要:**美丽中国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深切向往,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目标,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明标志。新质生产力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不仅重塑了经济发展格局,而且有力助推美丽中国建设。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美丽中国建设,需从生成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三个维度展开深入剖析,厘清其赋能机制。从生成逻辑看: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指导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统筹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经验总结、是新时代全面建设美丽中国宏伟目标的必然选择。然而,新质生产力在赋能美丽中国建设的过程中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一是生产要素支撑不足与传统产业转型困难并存;二是社会实践行动滞后与环保意识有待提升交织;三是生态制度体系不完善与社会治理协同不足同在。为此,针对上述困境需提出针对性与可操作性强的对策:一要优化生产要素,激发绿色转型活力;二要强化生态环保宣传教育,凝聚社会共治合力;三要完善生态制度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通过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作用,形成全民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新格局,走出一条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新路,为高效能、高质量、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美丽中国建设;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6)01-0005-11

**DOI:**10.19742/j.cnki.50-1164/C.260101

## 一、问题的缘起及研究综述

在推进绿色发展的进程中,建设美丽中国既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也是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题中应有之义,为中国绿色发展方案赢得国际认同奠定了目标基础<sup>[1]</sup>。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生态文明”首次列入“十三五”规划十大目标,“美丽中国”首次被写入五年规划。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宪法修正案,把“建设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历史性地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sup>[2]</sup>。这不仅表明了生态文明建设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重大意义,也凸显出美丽中国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美丽中国是生态环境优美、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有机统一,而新

**收稿日期:**2025-11-06

**作者简介:**戴春勤,男,甘肃泾川人,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逻辑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关键问题研究”(21XKS020)。

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sup>[3]</sup>。新质生产力以绿色为底色,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发展为核心支撑,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可持续的驱动力<sup>[4]</sup>。因此,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与美丽中国建设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目标高度契合,其绿色属性直接赋能美丽中国建设战略,推动生态环境保护 and 经济社会发展协同共进。

自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提出“新质生产力”重大论断以来,这一重要理论迅速引起国内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成为学术的热点议题。而建设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领域。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发现,学术界研究新质生产力与美丽中国建设的相关论述,主要聚焦二者间的相互关系、新质生产力对美丽中国建设的赋能对象及赋能路径。

关于新质生产力与美丽中国建设二者的关系,王广义、罗闰升提到,“新质生产力即绿色生产力,绿色生产力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美丽中国建设为绿色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sup>[5]</sup>。杜仕菊、叶晓宣认为,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有利于推动美丽中国的数字化建设<sup>[6]</sup>。周宏春从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视角出发,认为绿色生产力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强劲科技动力,美丽中国建设也将激活更多的绿色生产力<sup>[7]</sup>。王金南认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都必须依靠新质生产力<sup>[8]</sup>。相关研究均表明,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建设美丽中国是内在统一、相互促进的关系。新质生产力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内生动力和战略支点,美丽中国建设的目标则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实践场景载体和方向引领。

关于新质生产力赋能美丽中国建设的对象,王飞、韩晓媛、陈瑞华认为,新质生产力通过产业体系的系统化、安全化、创新化、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sup>[9]</sup>。周文、张奕涵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更好地以绿色科技创新、绿色先进产业、绿色生活方式赋能生态文明建设,为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注入新动能<sup>[10]</sup>。在美丽中国建设背景下,李新仓、杨宇潼以新质生产力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研究对象,探究新质生产力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为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中国智慧和解决方案<sup>[11]</sup>。罗川、杨丽娟提出,“新质生产力符合绿色发展理念,强调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共生、互促共荣”<sup>[12]</sup>。表明新质生产力赋能美丽中国建设从经济体系、制度体制、生态保护等方面入手,着力打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发展格局。

关于新质生产力赋能美丽中国建设的路径,韩娇柔从加快数字生态科技革新、突破低碳产业发展桎梏、推动消费模式变革及完善多层次协同治理架构这四个方面,阐述新质生产力如何推动美丽中国建设<sup>[13]</sup>。胡馨月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出发,从人才、资金、观念、技术四方面探讨新质生产力赋能美丽中国建设的实践路径<sup>[14]</sup>。王梁华从经济管理视角出发,认为税收制度绿化度不仅能够直接推动美丽中国建设,还可通过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进一步赋能美丽中国建设<sup>[15]</sup>。张云飞提出,“应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有机地统一起来,以推动形成先进的绿色化、生态化的科学技术和新质生产力,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强大而持续的科技动力”<sup>[16]</sup>。表明美丽中国建设需要社会多方面的支持,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美丽中国建设,必然离不开人才、科技、资金及政策等多重因素的支撑。

综上,国内学者对新质生产力赋能美丽中国建设“为什么赋”“赋什么”“如何赋”研究已取得初步成果,为后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然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新质生产力赋能美丽中国建设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对其生成逻辑、现实困境的分析尚不够深入。鉴于此,本文将新质生产力赋能美丽中国建设的生成逻辑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新质生产力赋能的内在必然性,并进一步分析新质生产力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最后为新质生产力赋能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具有可行性的实践路径。

##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美丽中国建设的生成逻辑

新质生产力既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指导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统筹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经验结晶,更是新时代回应全面建设美丽中国宏伟目标的科学指引。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美丽中国建设,不仅彰显了生态智慧在新时代的创造性发展,赓续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理念,而且植根于中国共产党对生产力绿色发展的实践探索,孕育于新时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践。

### (一)理论逻辑: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指导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创新

首先,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sup>[17]162-163</sup> 强调动物仅按照“自身物种的尺度”被动地进行生产,满足自身及幼仔的生存需要,属于片面生产;而人类的生产活动不仅超越肉体直接需要的局限,还运用“任何一个种的尺度”,结合主体的意志、目的和精神需要进行全面生产,将生态伦理和生产伦理相统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最终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共进。人的全面生产理论表明,劳动本身不再是单纯的谋生手段,其本身也可以成为目的。新质生产力正是这种“超越性”的当代体现,它不再依赖资源消耗、生产规模扩大等传统要素驱动的粗放增长模式,而是转向依靠技术、数据等新型要素,追求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模式。

其次,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sup>[18]204</sup> 这一论断强调了劳动工具是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尺度。劳动工具从石器到金属、从人力到机械、再到数字化与智能化工具的演进,持续提高了生产力水平,推动生产方式转型,深刻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而新质生产力正是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和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推动劳动工具的智能化、数字化升级,催生新产业、新模式,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良性互动。

最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sup>[19]743</sup> 这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或提高工人劳动强度等手段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积累的扩大进一步加剧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导致工人阶级状况持续恶化。而新质生产力则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创新生产组合方式,构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生产性积累体系,通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高效协同实现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升,打破了资本主义积累的恶性循环,超越了传统生产力的桎梏,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 (二)历史逻辑: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统筹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历史经验结晶

首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解放被严重束缚的社会生产力,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使国营经济掌握国民经济命脉,为后续的工业化奠定物质基础。这些改革措施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脉络一脉相承,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制度保障与历史经验。

其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着力调整生产关系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毛泽东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和谐的根本路径<sup>[20]</sup>。他强调科

学技术对生产力提升的关键作用,党和政府关注技术革命在推动发展过程中可能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既要发展生产,又要充分关注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把两方面的要求统一起来,统筹兼顾,全面安排”<sup>[21]</sup>,这为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思想与新质生产力所倡导的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的理念高度契合。

最后,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在驱动经济繁荣的同时,传统高污染、高耗能的发展模式加剧了资源约束趋紧与环境污染问题。党和国家深刻反思传统生产力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党中央在1983年12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战略指引<sup>[22]</sup>。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sup>[23]</sup><sup>274</sup>,强调科技进步是生态保护的核心支撑;江泽民同志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转变传统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驱动、可持续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的理念,不仅在思想层面为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等核心内涵提供了价值引领,更在实践层面为新质生产力的生成与发展奠定了理念与制度基础。

### (三) 现实逻辑: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全面建设美丽中国宏伟目标的科学回应

首先,回应“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作为五年规划(计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统领性制度载体<sup>[24]</sup>。从“十三五”强调坚持可持续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sup>[25]</sup>,到“十四五”明确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sup>[26]</sup>,再到“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sup>[2]</sup>,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不断优化。优美的生态环境是美丽中国的重要标志,“绿色”不仅是核心表征,更是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新质生产力本质上就是绿色生产力,与美丽中国建设的目标高度契合,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核心引擎。

其次,回应“生态优先”的核心准则。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sup>[27]</sup><sup>393</sup>。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将其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sup>[28]</sup>,彰显了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位。这一系列部署推动了生产力理论的革新,新质生产力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旧路径,将生态环境视为生产力发展的内生变量,其内涵天然蕴含着绿色基因,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力即征服自然能力”的片面认知,推动发展逻辑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跃升,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生产力发展的有机统一。

最后,回应“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sup>[29]</sup>美丽中国建设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人民群众享有更优美的生态环境和更高品质的生活环境,新质生产力聚焦“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的民生期盼,通过科技创新与数字赋能技术把生态愿景转化为现实成果,切实改善人居环境;同时,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态产品的需求又反向驱动生产力变革,催生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这一双向互动,不仅让人民在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中获得实实在在的福祉,更体现了新质生产力鲜明的民生导向,为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注入了新时代内涵。

##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美丽中国建设的现实困境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正加速迈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阶段,美丽中国建设成效显著,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然而,新质生产力赋能美丽中国建设仍面临诸多现实问题,制约着二者协同共进、深度融合的进程。

## （一）生产要素支撑不足，传统产业转型困难

### 1. “大国小农”制约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首先,新型农业劳动者短缺。劳动者是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更依赖高素质、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然而,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就业机会多,发展前景好,大量的农村青壮年持续向城市迁移,导致农村劳动力主体呈现老龄化特征,以“60后”“70后”为主,普遍存在受教育程度偏低、观念相对保守等问题,难以有效接纳和应用新技术,制约农业现代化进程。其次,农业核心技术能力薄弱,关键领域“卡脖子”问题凸显。以数字技术、智能装备为核心的现代农业技术普及面窄,科研平台数量不足。当前我国高端农机装备、传感器等关键部件依赖进口,生物育种技术受制于国际专利壁垒,技术自主可控能力较弱。数字农业、生态农业等新型模式的地方承接能力不足,高附加值、颠覆性创新成果大多停留在实验室和发达地区,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生产要素难以实现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无法满足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最后,农村配套基础设施薄弱,阻碍新质生产力落地生根。相较于城市,农村地区基础条件差,基层财政能力有限,资金投入不足,“融资难、融资贵”成为普遍梗阻。这导致现代化农业所需的智能灌溉、数字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难以在短期内形成系统化支撑体系,延缓了乡村全面振兴的步伐。

### 2. “三大障碍”制约工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首先,研发投入相对较低,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占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比重的6.91%<sup>[30]</sup>,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力量,对周期长、风险高的研究投入意愿弱,导致核心技术储备不足,自主创新能力受限。同时,传统产业绿色化、数字化转型需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引进低碳设备和绿色技术,而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困境,难以开展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其次,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困难,产学研用严重脱节。由于中间实验平台数量少,高校、科研机构的绿色技术成果多停留在实验阶段,与传统产业生产工艺和设备适配度不高,“实验室技术”无法高效转化为“生产线技术”。最后,生产模式固化,变革阻力较大。传统工业长期依赖于“高投入、高污染、高能耗”的粗放型增长路径,企业对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模式认知不足,老员工习惯传统操作流程,对智能化设备的接受度低、操作能力弱,内部存在“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的普遍现象。这种深层次的惯性思维与技能结构失衡,阻碍传统工业绿色转型升级。

## （二）社会实践活动滞后，环保意识有待提升

### 1. 绿色发展理念普及度不高

首先,在服务业领域,部分产业固守“重经济、轻生态”的传统观念,片面追逐短期利益,忽视生态环境承载力,导致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持续恶化、生态系统失衡。例如,某公司在2023年陕西榆林荒漠化地区违建高尔夫球场,违规抽取地下水,日耗水量高达上千吨,导致附近村民生产生活用水短缺。同时,球场内大量使用除草剂、化肥、灭虫剂等化学物品,污染了当地的水源和土壤,破坏了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其次,在工业领域,部分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为降低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违规偷排、超排工业废水,严重污染周边水体;同时随意倾倒固体废弃物,造成土壤污染与退化,加剧区域生态负担;最后,在农业领域,农民为实现增产增收,非法侵占大量林地,无序开垦荒地,破坏原有生态格局;其耕作方式仍以传统粗放型为主,种植结构单一,基础设施滞后。例如,南方地区种植水稻等农作物普遍采用大水漫灌方式,水资源浪费严重,这不仅加剧了区域水资源短缺,也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

### 2. 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乏力

首先,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主要以线下传统方式为主,如讲座、宣传栏等,传播形式单一,内容多停留在“口号式”“警示式”层面,例如“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等标语,缺乏趣味性和互动性,覆盖范围有限,难以引发大众的情感共鸣。其次,宣传工作偏重理论灌输,忽视了实践引导,多数人仅知晓“生态保护”

概念,但普遍缺乏垃圾分类、节能减排、光盘行动等具体实践参与与行为转化,导致认知与实践严重脱节。最后,社会公众往往将环境保护视为政府或企业的专属职责,认为个体力量无足轻重,因而缺乏对自身环境行为的约束,丧失主动参与和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感与行动力。

### 3. 社会多元思潮影响公众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内涵发生了重大改变,从改革开放初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向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sup>[31]</sup>。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不仅体现在对富裕物质生活的追求,更延伸至对生态优美、精神富足、环境宜居等高品质生活的向往。然而,在社会加速转型背景下,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等思潮持续蔓延,加之“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传统利己观念,导致公众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紧迫性认知薄弱,对个体行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缺乏深刻认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习惯于便捷高效但资源高耗的生活方式,欠缺转变传统消费模式与重塑绿色生活习惯的主动性与责任感。部分公众随意丢垃圾、随地吐痰等非环境友好型行为仍较为普遍。这些行为看似微小,实则反映出个人价值观念偏差,不仅加剧了环境治理的复杂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丽中国建设的进程。

## (三) 生态制度体系不全,社会治理协同薄弱

### 1. 新污染物法规条例尚不完善

当前我国现有的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法律法规,大多针对重金属、危化品等传统污染物,而对于微塑料、抗生素等新兴污染物的管控条款不足。新兴污染物的环境质量标准、排放标准及限值不明确,化学品环境风险评估、微塑料管控等制度仍处于前期探索阶段,难以应对复合型污染挑战。相关制度供给不足,企业缺乏刚性约束,易出现随意排放新污染物等行为;而环境监管部门执法依据不足,难以实施有效监管与精准执法,新污染物治理存在明显缺位。新污染物正逐渐成为阻碍我国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进程中的“新难点”<sup>[32]</sup>。

### 2. 考核与激励机制有待优化

尽管我国已颁布多项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但在生态价值补偿层面却缺乏系统性的激励机制和健全的政策支撑,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依旧突出。当前美丽中国建设考核指标更多侧重于环境质量,对绿色产业比重、生态产品价值、绿色环保技术的重视不足,存在指标片面化、静态化及更新滞后等问题。同时,激励方式以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为主,市场化与社会激励手段较少,难以对绿色产业、技术创新形成差异化、持续性的激励和补偿,政策长效性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进程。

### 3. 治理体系协同性不足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迫切需求,当前生态治理体系仍存在明显短板。生态治理涵盖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多个部门,但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职能条块分割、分属不同部门,易引发责任推诿或重复治理,陷入“九龙治水、各自为政”的治理困局。区域间与部门间协作壁垒突出,环境信息共享渠道单一,覆盖范围有限,数据孤岛现象明显,导致治理决策缺乏统一精准的数据支撑,削弱了应急响应、联合执法与整体治理的科学性与时效性,弱化了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在生态监测、风险预警与协同治理中的联动效能,严重制约了跨区域、跨流域生态治理任务的高效推进。例如,在2025年11月云南彝良山区被曝光存在数百吨垃圾非法堆放,事件曝光后迅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与深思,推动当地政府启动应急响应,处置长期积存的垃圾问题。这一迟滞响应背后,暴露出生态环境治理中监管链条断裂、责任体系缺位,最终让青山沦为垃圾场,生态底线失守。

## 四、新质生产力赋能美丽中国建设的实践路径

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sup>[33]</sup>。以

新质生产力为重要抓手,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举措。为此,应从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增强全社会生态环保意识、完善生态制度体系三方面发力,构建新质生产力赋能美丽中国建设的路径。

### (一) 优化生产要素,激发绿色转型活力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sup>[2]</sup>。因此,迫切需要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打造现代化农业、绿色工业发展新路径,让生态优势持续释放经济价值。

#### 1. 发展现代化农业

建设美丽中国的重点和难点在乡村<sup>[34]</sup>。一是建立新型劳动者队伍。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资源,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完善乡村人才培育和发展机制”<sup>[35]</sup>。为此,需优化教育体系,引导涉农高校增设智慧农业等新兴专业,强化交叉学科建设,夯实青年人才储备基础;加强农民技能培训,重点提升在智能设施操作、农产品电商营销等方面的能力,加速将技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二是加大农业技术研发力度。科技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要加大对基因编辑、分子设计育种等核心技术和高端农业设备研发投入,培育高产抗逆的优质品种,降低技术、种源的对外依赖度。三是普及农业智能设施。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先决条件,为新技术、新产业的落地与高效运行提供底层保障。为此,现代农业需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结合遥感技术和AI算法,实现作物长势预测与灾害预警;推广机械化种植、智能化灌溉、精准化施肥一体化智慧作业系统,推动农业生产向数据驱动跃升,提升农业数字化水平。甘肃省崇信县的农业数字化转型探索,正是新质生产力赋能美丽中国建设在农业领域的生动实践。崇信县积极引入大数据、物联网等新质生产力要素,搭建数字农业云平台,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型升级。通过智能化养殖与种植技术革新,不仅显著提升了农产品产量,更实现了农业资源的集约利用与生态环境有效保护。

#### 2. 发展绿色化工业

绿色发展是对传统发展方式的根本性变革<sup>[36]</sup>。一是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绿色金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为强化其支撑作用,政府应设立绿色专项资金,对清洁能源项目给予运行期财政补贴,并对工业资源循环利用试点基地提供综合奖补;同时,落实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绿色导向政策,激活企业转型动能。金融机构要不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如绿色债券、绿色贷款和生态保险等,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同时,依托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企业的碳配额作为资产进行质押融资,形成减排的市场化激励机制。二是搭建数字平台,攻坚核心技术。科技不仅深度融入生产力,赋能生产力,更是对生产力的质变性革新<sup>[37]</sup>。为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对工业绿色发展的驱动作用,企业亟须构建“数字孪生”平台。依托大数据与仿真技术,在虚拟空间中构建与现实生产线高度一致的“数字镜像”,通过算法驱动,模拟不同绿色工艺的运行效果,提前筛选最优方案,从而压缩技术的研发周期与试错成本。同时,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企业根据技术痛点出题,高校和科研院所围绕难题进行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攻关,为企业解题,破解技术转化难题,加速成果产业化。三是构建数智化绿色生产新范式。绿色是新质生产力的鲜明底色,必须将绿色理念融入生产全过程。企业要重建“需求驱动”的智能柔性生产链,建立“C2M(消费者直连或驱动制造)”平台,消费者通过互联网平台直接向制造商下订单,将需求数据直接转化为生产指令,实现“接单生产”,从而在源头减少库存积压和资源浪费。

### (二) 增强生态环保意识,凝聚社会共治合力

美丽中国建设既需要发挥政府自上而下的统筹引领作用,也需要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积极参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sup>[38]</sup><sup>[323]</sup>为此,必须增强公众生态环保意识,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

### 1. 全面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一是企业要坚定践行绿色理念。新质生产力摆脱了依赖大量资源投入和高能耗的旧路径,与新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企业应将生态效益纳入生产力评价体系,推动生产力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转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协同增值。二是借助数字平台提升公众生态意识。在社区、广场等公共场所设置“生态科普大屏”,公开大气环境、水文水质等环境数据,将抽象数据可视化,增强公众日常感知;借鉴支付宝“蚂蚁森林”模式,开发“低碳生活积分 APP”,量化用户绿色行为并转化为实际权益。三是培育绿色文化,树立生态价值观。以家庭、学校、社会为单位,通过深入开展生态道德教育,将生态文化和生态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激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呵护人类共同家园<sup>[39]</sup>。

### 2. 创新生态文明教育方式

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新技术、新思维,将生态教育升级为一场沉浸式、互动式的智慧体验。一是数字技术赋能环境教育。运用 VR、AR 等技术,构建沉浸式数字化场景。利用 VR 技术逼真还原植被破坏后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过程,或 AR 技术动态呈现植树造林带来的空气质量的显著改善,打造“生态危机警示”与“绿色成果感知”体验模块,从而增强公众对生态环境变化的直观感受与切身认知。二是跨界融合拓宽教育范围。学校应构建“课内+课外”双向联动体系,开展研学活动,组织学生走进森林、湿地等生态场所,在真实场景中感受生态之美,深化学习体验。三是教育成果反哺绿色发展。学校要开设绿色教育课程,举办“变废为宝”“生态校园”等主题活动,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学生的生态环保意识,推动教育成果转化为绿色行动力。

### 3. 联动社会多元主体

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质就是一种全社会广泛动员的共同治理<sup>[40]</sup>。依托新质生产力,需从三方面发力。一是技术赋能,构建智慧监管体系。政府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打造高标准的生态环境智慧平台。打通多元主体间的信息堵点,推动治理模式向主动预防和精准施策转变。二是价值引领,凝聚绿色文化共识。新质生产力驱动媒体平台创新发展,主流媒体应聚焦“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主题,创作多元化的宣传作品。通过深度解读普及新质生产力内涵,引导全社会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为美丽中国建设筑牢思想根基。三是机制创新,激活公众参与活力。运用数字化手段开发便民环保应用,实时向公众推送空气、土壤等环境数据。同时,建立异常数据自动预警机制,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与监督权,推动环境治理实现从“政府独管”到“社会共治”的根本性转变。

### (三) 完善生态制度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sup>[41]</sup>。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sup>[42]</sup>。生态文明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一环,关乎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面对当前美丽中国建设中突出的环境问题,必须贯彻“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重”的思路,统筹推进制度建设。

#### 1. 强化新污染防治立法保障

面对新污染物存在立法不足问题,新质生产力驱动立法理念革新、提供技术支撑,推动新污染物治理从末端治理转向全链条管控。一方面,立法机关制定系统性、高标准的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法律法规,明确新污染物的定义、涵盖范围、管控边界与防范治理措施,为环保部门的治理工作提供根本遵循;另一方面,环保部门全面梳理现有污染物排放标准,密切跟踪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新污染物并将其纳入管控范畴;加快建立新污染物治理标准体系,研究制定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与管控技术标准框架,以及新污染物检测分析方法类国家标准等,为新污染物的监测、评估和治理提供具体的技术规范。

## 2. 优化考核和激励机制

一是重构生态考核指标体系。新质生产力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为特征,要求生态考核机制从单一经济指标转向“经济+生态”并重,增设绿色技术占比、低碳产业产值增速等指标,全面激发企业的绿色活力。二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配套并实施差异化考核机制,避免“一刀切”。对生态保护区,重点考核生态修复成效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对工业区,则侧重评估传统高能耗产业的减污降碳效果。三是优化激励机制。新质生产力推动激励机制从“行政命令式”转向“市场驱动型”。对于生态保护者,除财政支持外,还应提供先进环保技术和设备支持,并授予荣誉称号;对于绿色企业,不仅给予税收减免、贷款优惠等政策支持,还应用绿色金融、碳交易等市场化手段,拓宽激励渠道。

## 3. 健全区域生态治理机制

一是整合多部门的环境数据信息。依托新质生产力的数据要素优势,建立全国统一的生态治理数据平台,将碎片化信息转化为系统化资源,实现数据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提高决策效能。例如,在可鲁克湖—托素湖自然保护区,工程师孔繁燕改进原有设备,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把零散数据汇集于涵盖水文、植被等六大类的统一数字平台,大幅提升了监测效率,为保护鸟类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二是推动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实现对环境污染的动态模拟与风险预警,推动治理模式从“事后追责”向“事前预警、事中调控”转变,提升联合监测、执法与应急处置能力。三是共建协同治理体系。推行“发达地区出资出技、欠发达地区护源护绿”协作模式,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通过利益互补,实现上中下游在责任共担中协同发展、在成果共享中互利共赢,构建生态治理新范式。

## 五、结语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革命对传统生产要素的重构与升级,它通过培育高质量的劳动者,发展数智化的劳动工具,拓展多元化的劳动对象,最终实现生产力“质”的有效提升。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美丽中国建设,是绿色发展理念在中国的生动生态实践,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诠释,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关键抓手。美丽中国建设非一日之功,绿色发展需久久为功。我们必须坚持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以绿色为底色、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统筹技术革新、意识提升与制度建设,才能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让美丽中国建设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行稳致远。

## [参 考 文 献]

- [1] 徐海红. 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愿景与实践路径[J]. 广西社会科学, 2023(4):10-16.
-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 人民日报, 2025-10-29(1).
- [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4-02-02(1).
- [4] 李桂花, 吴诗洁.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理论内涵、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向[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4(12):27-38.
- [5] 王广义, 罗闰升.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以发展绿色生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J]. 理论探讨, 2024(5):137-143.
- [6] 杜仕菊, 叶晓宣. 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的逻辑理路、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6):52-61.
- [7] 周宏春. “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的内涵特征与产业载体[J]. 生态经济, 2024(7):13-19.

- [8] 郭媛媛,刘丹. 大力发展绿色低碳新质生产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美丽中国——访全国政协委员、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名誉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J]. 环境保护,2024(5):12-16.
- [9] 王飞,韩晓媛,陈瑞华. 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 当代经济管理,2024(6):12-19.
- [10] 周文,张奕涵. 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J]. 生态文明研究,2024(4):17-30.
- [11] 李新仓,杨宇潼. 新质生产力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内涵要义、现实困局与纾解对策[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11):23-30.
- [12] 罗川,杨丽娟. 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的逻辑理路与实践指向[J/OL].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180.C.20250506.1802.002>.
- [13] 韩娇柔. 新质生产力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逻辑理路、现实梗阻与基本途径[J]. 重庆社会科学,2024(9):6-20.
- [14] 胡馨月. 新质生产力赋能美丽中国建设的内在逻辑与进路[J]. 唐山学院学报,2025(4):37-41.
- [15] 王梁华. 税制绿化度、新质生产力与美丽中国建设[J]. 华东经济管理,2025(5):71-79.
- [16] 张云飞.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1-11,109.
-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0] 杨德山,蔡雯琪.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理论探索[J]. 党的文献,2025(4):103-110.
- [21] 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J]. 工业用水与废水,1974(2):38-41.
- [22] 苏星鸿. 理解和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四个维度[J].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9(3):17-25.
- [2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4] 张浩,郭鹏. 五年规划引领美丽中国建设的制度演进、历史经验与未来展望——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17-25.
- [25] 杨航.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D]. 长春:吉林财经大学,2017.
- [26]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 人民日报,2020-11-04(1).
- [2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28]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22-10-26(1).
- [29] 习近平.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J]. 求是,2025(12):4-12.
- [30] 2024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超过3.6万亿元[N]. 中国信息报,2025-01-26(1).
- [31] 陈树文,王敏. 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研究——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分析[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262-274.
- [32] 赵淑莉,陈少坤,于秀豪,等. 美丽中国建设过程中重点关注的新污染物监测研究[J]. 中国环境科学,2024(8):4576-4587.
- [33] 张胜.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灯塔[N]. 光明日报,2025-08-21(5).
- [34] 王卫星. 美丽乡村建设:现状与对策[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1-6.
- [35]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25-02-24(1).
- [36] 郑保卫,郑权.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背景、理论内涵与实践意义[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9-17.
- [37] 田方林,魏榛. 新质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理论的丰富与发展[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5-15.
- [3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39] 苏继月,孙道进.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对西方生态思想的颠覆[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46-58,330.
- [40] 张静. 新时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视域下的共建共治共享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93-108.

[41] 柳思,董军.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研究——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5):156-168.

[42]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 中央政治局主持全会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2024-07-19(1).

## The Generation Logic, Practical Dilemma and Practical Path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powe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Dai Chunqin Meng Liting

(School of Marxism,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Gansu 730050, China)

**Abstract:** Beautiful China not only carries the Chinese nation's deep yearning for a bet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t also the practical goa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is also a clear symbol of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of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has not only reshap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but also accelerated the pace of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To empower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from three dimensions: generation logic, practical dilemma and practical path, and reveal its enabling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tive logic,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Marxist productivity theory to guide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coordina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the scientific response to the grand goal of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in an all-round way in the new era. Howeve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till face many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 of empowe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first, insufficient support for production factor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coexist; second, the lag in social practice an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need to be improved. Third, the ecological system is incomplete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s weak. To this end, feasible measures must be put forward for the above dilemma: first, optimize production factors and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second, we must improve the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unite the joint forces of social co-governance. Third, we must improve the ecological system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ocial governance. B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core rol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 new pattern of participation of the whole peop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will be formed, a new path of green, low-carb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ll be embarked on, and a steady stream of strong impetus will be injected into the efficient and high-quality promo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左福生]